

清代藏书文化研究

倪德茂 曾琦 华礼娴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清代藏书文化研究 / 倪德茂, 曾琦, 华礼娴著. —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22.1
ISBN 978-7-5643-8514-9

I. ①清… II. ①倪… ②曾… ③华… III. ①藏书—
文化研究—中国—清代 IV. ①G259.2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1) 第 273857 号

Qingdai Cangshu Wenhua Yanjiu

清代藏书文化研究

倪德茂 曾琦 华礼娴 著

责任编辑 居碧娟
助理编辑 徐茂嘉
封面设计 原谋书装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西南交通大学创新大厦 21 楼)

邮政编码 610031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网址 <http://www.xnjdcbs.com>
印刷 四川煤田地质制图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8 mm × 210 mm
印张 8.875
字数 215 千
版次 2022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22 年 1 月第 1 次
书号 ISBN 978-7-5643-8514-9
定价 45.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前 言

书籍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而藏书又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的文字是商周时期遗留下来的甲骨文，它们是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的文字。古人们用这些刻着古老文字的甲骨来占卜、记事。到目前为止，共发现这种刻着文字的甲骨超过十万片，其内容涵养了商周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多方面。除甲骨文以外，我国早期的文字还有铸在青铜器上的铭文，它们被称为“金文”“铭文”“钟鼎文”；刻在石器上的文字，它们被称为“石鼓文”。文字的出现，结束了人类结绳记事的历史，为书籍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在已发现的石器和青铜器中，有的上面文字较多，例如，在西周时期铸造的毛公鼎上的铭文就多达四五百字。这些有许多文字的青铜器或石器已经具备了书籍的初期形式^①。到了商代后期，“书籍诞生的各种条件均已具备，商代的典、册就是中国最早的具有传播意义的书，它们是中国简帛书籍的源头。”^②

随着书籍的产生，藏书活动也随之产生，据说在夏商周时期就有了名叫“藏室”“册府”等名称的藏书机构，甚至出现

① 李致忠. 中国古代书籍史[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28.

② 耿相新. 中国简帛书籍史[M]. 北京：三联书店，2011：11.

了私人藏书家^①。在雕版印刷术未发明之前，由于书籍的生产只能依靠手抄书，其生产书籍的速度很慢，因此，可以断定当时的藏书规模不可能很大，藏书机构与藏书家的数量也不可能很多。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书籍的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高，从而促进了藏书活动的发展。到了北宋时期，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技术，使得中国的印刷技术更向前迈进了一步。在宋、元、明时期，印刷行业是雕版印刷与活字印刷并行，但以雕版印刷为主流。在宋、元时期，雕版印刷技术十分成熟，加之印刷之家十分注重印刷质量控制，因此，当时所印刷的书籍质量极佳，为后来“佞宋”“佞元”等藏书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到了清朝中后期，我国印刷业在传承了传统的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的基础上，也积极吸纳西方的石印、铅印等新式印刷技术，从而使得清代印刷出版业空前发达。在清代“各刻书要地有堂号可考的，如北京 112 家，苏州 53 家，广州 23 家，佛山 12 家”^②。

清代考据学兴盛，不论考据学家们是从事古籍文献的校勘、整理、注疏、辑佚书、辨伪书，还是从事于对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读音研究，还是对古代典章制度、天文、历算、舆地的进行研究等，都离不开书籍。没有必要的书籍，考据学家们无论有多大能力也不可能做出什么成绩。清代印刷出版业发

① 毛昭晰. 浙江藏书家之精神（代序）[M]//黄建国，高跃新. 中国古代藏书楼研究. 北京：中华书局，1999：1.

② 李瑞良. 中国古代图书流通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56.

达, 这为考据学家们获得充足的书籍提供了保障。为方便研究, 许多考据学家们都收藏有大量的书籍以备研究之需, 因此, 在清代藏书家中有许多都是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 这也是清代藏书文化的一大特色。

清代藏书主体与前代一样大致可分为三类: 官府及宫廷藏书、书院藏书、私人藏书。无论是哪一类藏书, 其规模都较之前时代大很多, 尤其是清代的私人藏书规模较前代是空前扩大: 可收录清代藏书家人数比之前历代藏书家人数的总和还多^①; 许多清代私人藏书家其藏书量达十万卷, 甚至数十万卷。例如, 清代藏书家刘承干在其自述中承认, 他在十多年间积书达五十万册^②, 其藏书量甚至比当今许多县市级公立图书馆藏书量还多。因此, 本书的研究对象中虽然包括了官府及宫廷藏书、书院藏书、私人藏书这三大部分, 但更多的是偏重研究私人藏书。

清代藏书事业发达得益于清代印刷出版业发达。由于印刷出版业发达, 使得清代藏书人能够比较容易地获得书籍, “挟资入贾肆, 可立致数万卷。”^③此外, 清代藏书事业发达也由于清代是我国封建文化的总结时期。在此期间, 不论是官府还是民间都热衷于编纂大型的类书、丛书, 他们将前代书籍整理、分类后以类书或丛书的形式重新出版发行。例如, 清廷编纂有《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渊鉴类函》等, 民间编纂有《学

① 范凤书. 中国私家藏书史[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 269.

② 刘承干. 熹业老人八十自叙[M]//缪荃孙, 吴昌绶, 董康. 熹业堂藏书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7: 1410.

③ 曹溶. 流通古书约[M]. 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35.

津讨原》《墨海金壶》《借月山房汇钞》《太平御览》《金文最》等大型类书或丛书。大型类书、丛书的编纂一方面丰富了清代的藏书内容，另一方面也起着激励藏书的作用。

随着藏书事业的兴盛，藏书文化也随之发展起来。藏书文化包括了藏书楼名、藏书印文、藏书思想，以及藏书著作等多方面。中国传统的藏书机构是藏书楼，只是到了近代图书馆才代替传统的藏书楼成为我国藏书的主要机构。中国的藏书楼通常都有一个名字，而藏书楼的命名是有讲究的。大体来说，藏书楼命名可分为以下几类：根据藏书楼所在地理位置命名、根据藏书楼周边环境命名、根据藏书楼内藏品命名、根据前人诗文命名、根据民间传说或典故来命名。此外，还有的藏书楼命名还反映了藏书楼主人的某种崇敬、爱好、期望等心情。丰富的藏书楼名是中国藏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藏书印最初的功能仅是表明藏书归谁所有，因此，早期的藏书印印文简单，不外乎就是“某某藏书”“某某鉴赏”“某某宝藏”之类。到了清朝时期，藏书印印文不仅字数更加灵活，其印文内容也丰富多彩：在印文字数上，既有仅有一两个字的藏书印，也有字数多达上百字的藏书印，甚至还有只有图案，没有文字的藏书印。印文字体涵盖了隶、篆、草、行、楷、甲骨文等多种字体，印文文字既有汉字，也有少数民族文字。印文内容反映了藏书家姓名、身份、里居、爱好、企盼，以及对图书之爱、读书之乐等信息。虽然单个的藏书印文或藏书楼名所反映的信息很有限，但是将这千千万万的藏书印文和藏书楼名总括起来就能反

映出清代藏书文化的方方面面，里面蕴含着海量的藏书信息，它们是研究藏书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材料。

无论是公家藏书还是私人藏书，他们都带有一定的目的性。他们在长期的藏书活动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藏书思想。清代藏书家在继承和发扬前人藏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繁复的藏书思想。清代盛行的藏书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类：世守其藏的藏书思想、固守其藏的藏书思想、藏书开放思想、好古求宋的藏书思想（主要的是“佞宋”思想）、藏以致用的藏书思想等。在这些藏书思想中既有反映中国传统藏书家藏书心态的藏书思想，也有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藏书家顺应时代潮流的藏书思想。例如，藏以致用的思想就反映了藏书家们面对西学东渐、西方文明不断冲击中国传统文明的大背景下，中国藏书家们主动改变以往那种只注重收藏经史子集类书籍，不注重收藏科学、技术类实用书籍的传统。

如果说藏书楼名、藏书印文、藏书思想是藏书文化的重要体现，那么藏书著作无疑是藏书文化最直接、最系统的表现。清代不仅藏书事业发达，其藏书研究也十分活跃。可以说清代是我国古代藏书技术和藏书思想得到系统、全面的总结的时期，是我国古代藏书学内容最丰富的时期^①。在此期间，关于藏书研究的学术专著大量涌现。这些学术专著大体可分为目录学类著作、版本与校勘学类著作、藏书保护类著作、藏书理论研究专著、藏书纪事诗等。其中，以藏书目录学类著作最多。

^① 李日法. 湘籍藏书家袁芳瑛[J]. 湘潭师范学院学报, 1995(4): 2.

清代考据学发达、藏书事业兴盛从而促进了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小学”的发展。由于藏书事业兴盛，藏书越来越多，如何保护藏书，避免藏书遭受水、火、虫、兵燹等损害便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从而促进了清代藏书保护研究。此外，藏书事业兴盛也促进了图书收集、典藏以及藏书史等相关研究的发展。藏书纪事诗是清代藏书文化中的一个有趣东西，它以诗歌的形式为藏书家立传。在藏书纪事诗体著作中，每一位藏书家的小传包括一首诗、注文、按语三个部分。其中诗歌的内容通常是撮录藏书家们最具特征的藏书楼号、藏品、藏书事迹、著作、学术观点等。清代藏书家叶昌炽首创藏书纪事诗体裁，以后藏书纪事诗体著作陆续出现，在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编纂藏书纪事诗体专著的风潮。藏书纪事诗是中国藏书文化中所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

清朝是我国藏书事业的一个大转折时期，我国藏书主体机构由藏书楼向图书馆转变就发生在清朝中后期。传统藏书楼的职能在于储藏图书，它的藏书通常会被束之高阁，只有少数特定人员才有资格进入藏书楼阅读。图书馆比传统藏书楼更具有开放性，它的职能在于服务社会民众，它以其藏书服务于社会民众。清朝中后期西方图书馆学思想传入我国，这无疑会促进我国藏书主体由藏书楼向图书馆转变，但是，通过研究清代藏书思想可以断定，即使没有西方图书馆学思想的传入，我国的藏书主体仍然会由藏书楼向图书馆转变，只不过它的转变速度要缓慢一些而已。我国藏书主体由藏书楼向图书馆转变的过程

持续时间很长，它从清代中后期开始，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甚至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时，虽然有部分图书馆在建设、创办，但是切于实用的图书馆仍然不多。许多以前的旧式藏书楼虽然也挂了一块“某某图书馆”的牌子，但其实是换汤不换药^①。藏书主体的转变对于藏书文化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过去那种体现传统藏书文化的符号，如藏书楼名、藏书印文到了图书馆时代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它们无疑不再像以前那样丰富多彩了。此外，在图书馆时代的藏书思想、藏书著作等都较藏书楼时代有很大的差异。从这层意义上说，清代既是我国藏书主体发生变化的大转折时期，也是我国藏书文化发生变化的大转折时期。这也是本文选择清代藏书文化作为研究对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专门以清代藏书文化作为研究对象的前期成果目前尚无，在已有的清代藏书史研究成果中，更多的是从藏书楼、藏书家、藏书思想或者从校刊、目录学等角度开展研究。在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有的也涉及清代藏书文化内容，但是藏书文化并不是它们主要关注的对象：《清代藏书史论稿》^②一书分为三个部分，上编主要是对清代重要藏书家史实进行相关考订、研究；中编对清代部分著作从版本学方面开展研究；下编主要研究古籍题跋及古籍校勘。该书论证严谨，考证详实，但是对于

① 刘廷元. 图书馆与藏书楼[J]. 工读试刊, 1935(3): 14.

② 刘鹏. 清代藏书史论稿[M].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8.

藏书文化方面涉猎不多。《清代藏书思想研究》^①以清代藏书思想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清代藏书思想发展历史背景，并从藏书收集思想、保存思想、儒藏思想、藏书开放思想以及清代藏书思想著述等方面展开研究。藏书思想是藏书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藏书文化所包含的内容更为广泛，该书中对于其他方面的藏书文化着墨不多。《清代江南藏书家刻书研究》^②从藏书家刻书活动的角度研究清代江南藏书家刻书活动，其立意新颖。在书中，作者提出江南藏书家刻书具有种类齐全、数量繁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校勘精审等特点，提出刻书与藏书相辅而行，凡刻书发达的地方，其藏书也兴盛，而藏书兴盛的地方，其刻书业也繁荣的观点。清代藏书家热衷于藏书、校勘书、刻书，刻书也构成清代藏书文化的一个方面。

有的成果是就清代某个具体藏书家、藏书楼开展研究，这些成果中也或多或少地涉及清代藏书文化的内容。如《黄丕烈评传》^③一书从黄丕烈的精神境界、生活志趣、学术交游以及他的版本学思想与方法、藏书活动与藏书思想等方面对这位清代著名的藏书家展开了论述。《瞿氏铁琴铜剑楼研究》^④从铁琴铜剑楼在中国藏书史中的地位、藏书楼历代主人事迹、楼中所藏精品图书及文物、藏书楼主人的交往、藏书楼建筑及藏书楼现状等对铁琴铜剑楼作了全方位的考察。在书中也部分涉及吴

① 王蕾. 清代藏书思想研究[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② 王桂平. 清代江南藏书家刻书研究[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8.

③ 姚伯岳. 黄丕烈评传[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④ 曹培根. 瞿氏铁琴铜剑楼研究[M]. 苏州: 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8.

地藏书文化等藏书文化内容。《天一阁藏书史志》^①为研究天一阁文集。天一阁虽然建于明代，但是它在清代藏书史上仍然占有重要地位。书中关于天一阁刻书、碑目、艺文等内容中也包含有清代藏书文化内容。

本书是在三位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完成的，为编写此书，三位作者既分工又合作，大家齐心协力查找资料、鉴别资料、商讨编写体例与文章结构。在编写过程中，遇到有争议的学术问题大家共同探讨。在编写过程中，又做了分工：倪德茂完成了前言、第二章、第五章、结语和第四章第三部分的编写；曾琦完成了第一章和第四章第一、二部分的编写工作；华礼娴完成了第三章和第四章第四部分的编写工作。

在文献使用上，本研究坚持能够使用第一手材料的就不使用二手材料。在资料搜集过程中，我们除了查阅大量清人的别集、笔记、传记，还翻阅了大量旧报纸、杂志、地方志。由于藏书文化涉及大量清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为此，作者查阅了大量的工具书如《中国藏书家辞典》《简明古籍辞典》《历代藏书家辞典》《苏州文化手册》《中国室名大辞典》《中国历代官制大辞典》《经学辞典》等。在资料搜集过程中，抄录了几十万字的笔记。正是有这些丰富的资料成为写作基础，才有了本书的顺利出版面世。

^① 骆兆平. 天一阁藏书史志[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目 录

第一章

清代藏书事业发达的背景

2 / 一、主流文化的转变刺激了藏书事业的发展

5 / 二、印刷术发展和书市繁荣

第二章

清代藏书文化的特点

23 / 一、藏书规模大

错误!未定义书签。 / 二、藏书地域分布不均衡

错误!未定义书签。 / 三、藏书学术研究活跃

错误!未定义书签。 / 四、藏书在藏书家之间不停地流转

第三章

清代著名藏书家与藏书楼

错误!未定义书签。 / 一、清代著名藏书家

错误!未定义书签。 / 二、清代著名藏书楼

第四章

清代藏书文化的体现

错误!未定义书签。 / 一、藏书思想

错误!未定义书签。 / 二、藏书印

错误!未定义书签。 / 三、藏书楼命名文化

错误!未定义书签。 / 四、清代时藏书研究著作

第五章

清末藏书文化的嬗变——从传统藏书楼到图书馆

错误!未定义书签。 / 一、图书馆与藏书楼的区别

错误!未定义书签。 / 二、我国图书馆发展状况

错误!未定义书签。 / 三、我国早期图书馆事业之特征

错误!未定义书签。 / 参考文献

错误!未定义书签。 / 后记

第一章

清代藏书事业发达的背景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四大古文明之一。中华文明的传承离不开书籍。书籍作为文明的载体在我国出现较早。随着书籍的产生，便产生了藏书活动。藏书活动在我国出现的时间也较早。据《史记》记载，在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老子就曾担任“周守藏室之史”。这里所谓的“藏室之史”即是“周藏书室之史也”^①。从这段记载可知，至少在春秋时期，我国就有了官办的藏书机构，并设置有专职的藏书管理人员。到了清朝时期，我国的藏书事业达到了空前繁荣的阶段：藏书楼数量远较之前时代多；藏书家人数远较之前时代多；藏书家藏书规模庞大，藏书量在十万卷以上的藏书家也不在少数；各种藏书思想并存，与藏书相关的著作大量涌现。清代藏书事业空前发达是与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分不开的。

一、主流文化的转变刺激了藏书事业的发展

一个社会的藏书事业发达与否与其社会文化发达与否紧密联系，文化越发达的社会，其藏书事业越发达。在社会文化中，主流的社会文化对于藏书事业的发达与否又起着主要决定作用。这里大致探讨下我国主流文化与藏书事业之间的关系。

（一）我国主流文化的大致演进流程

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便

^①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2140.

成为中国的官方统治学说，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但是，儒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孟子继承了孔子儒学的精髓的同时，发展了儒学。他在孔子“仁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仁政学说。孔子仁学主张“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仁归焉”。在如何才能做到“仁”上，孔子提出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①，即不合乎礼的东西不要去看，也不要去看。孟子在这基础上提出“仁政”说，他针对当时地主阶级激进派推行的“严刑峻法”的政治措施，提出自己“仁政”的主张。孟子反对当时新兴的地主阶级改革家商鞅主张积极开垦土地、鼓励私人占有土地、招徕劳动力等措施，主张通过“井田制”的形式来实现用自己设想的“仁政”措施，具体做法就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②。他所谓的“仁政”措施，就是想“通过‘井田制’的形式来推行封建制度”^③。到了西汉时期，董仲舒又将“大一统”“天人感应”等思想纳入儒学之中。他认为要实现“一统”就必须“尊君”。他说：“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④到了宋、明时期，程颐、程颢、陆九渊、朱熹、王守仁等人援佛入儒、援道入儒，充分吸取了释、道精华用于改造儒学，将儒学发展到理学阶段。理学又大体可分为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两大流派。

① 孔子. 论语[M]. 刘兆伟, 译注.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 254.

② 孟子. 孟子[M]. 颜兴林, 译注. 南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014: 84-85.

③ 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 中国哲学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53.

④ 董仲舒. 春秋繁露[M]. 曾振宇, 注说.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9: 343.

理学将“理”或“心”看为世界的本源。在理学阶段，儒学具有了哲学性质。但是，由于理学不重视实际研究，专注于探讨虚无缥缈的性命义理，到了明末清初时期，理学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诟病，人们认为王学末流成天只知空谈心性，对于实际事务毫无用处。吕留良就曾批评王学末流道：“今时讲学之徒，开口高谈性命，卒遇小事，便不能办，偶然为乡里处分一件公事，便纷然终日不绝。”^①因此，到了清代，中国学术主流由理学转为专注于实际研究的考据学（亦称朴学、汉学）。

（二）考据学的兴盛刺激了清朝藏书业发达

清代，中国学术主流由理学转为专注于实际研究的考据学。在清朝考据学发达，特别是在乾隆、嘉庆时期。清朝是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时期，我国在“学术、文化上呈现出‘总结期’的特征。这突出表现为规模空前的大型类书、丛书的编纂，以及众多学者对繁复的古代典籍进行训诂、考订、校勘、辑佚等细致的整理”。^②这种细致工作成就了考据学的兴盛。

考据学不同于理学。理学专谈性命义理，比较空疏，而考据学是一门实证科学。考据学的研究内容十分广泛，包括：对古籍文献的校勘、整理、注疏、辑佚书、辨伪书，对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读音研究，对古代典章制度、天文、历算、舆地等的研究，等等。从考据学的研究范围可以看出来，无论考据学家们是从事

① 车鼎丰. 晚邨吕子评语正编. 外附亲炙录八十九条[M]//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 续修四库全书.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520.

② 赵毅, 赵轶峰. 中国古代史(下册)[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369.

哪一个方向的研究，都离不开大量高质量的图书作为研究对象。没有相当数量的高质量书籍，考据学家们无论有多大的能力也不可能做出什么研究成果。因此，清代考据学的兴盛，扩大了社会对于图书的需求，有利于清代藏书事业的发展。此外，考据学家们为了方便学术研究，热衷于藏书。因此，清代的许多藏书家同时也是学问功底深厚的学者。王桂平认为：“清代江南藏书家大多学识渊博，著述较丰，既是收藏家，又是刻书家。他们为了读书做学问而刻书，如果请人代刻，不但豕鱼鲁亥^①，各类差错比比皆是，而且要付出昂贵的代价，倒不如自刻方便。”^②例如，被称为清代三大考据学家的王鸣盛、钱大昕、赵翼都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

总之，当我国主流文化由宋明时期的理学转变为清代的考据学之后，考据学的兴盛刺激了清代藏书业的发展。藏书事业的发展又为考据学家们提供了研究的方便，从而又进一步促进了考据学的发展。因此，在清朝时期，藏书事业与考据学之间关系是相互促进、互为因果的，从而推动了考据学与藏书事业的共同发展。

二、印刷术发展和书市繁荣

（一）清代印刷术空前发展

我国是最早发明印刷技术的国家之一。清代中晚期以前，我国的印刷技术大体包括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两大类。其中，

^① 王桂平读书原文如此，一般作“鲁鱼亥豕”。

^② 王桂平. 清代江南藏书家刻书研究[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54.

又以雕版印刷发明最早。清中期以前，雕版印刷也是中国印刷业的主流。当时社会上所印刷的书籍，主要是雕版印刷的，“活字本的数量仅及雕版书之百分之一二”^①。到了清代中后期，石印技术、铅活字印刷技术等先进的印刷技术传入我国，并逐步取代雕版印刷成为印刷业的主流。

1. 雕版印刷技术的发展

蒋元卿认为，直接使中国图书走上雕版印刷一途的，约而论之，可有下列两种原因，一是经典刻石的盛行。“经典刻石，始自汉灵帝熹平四年，成于光和六年”，二是大避邪印与佛像印。当时的道士们所佩戴的枣木避邪大印，有的刻字多达四百。不过这种避邪印“并无传播之意，故尚不能即谓之印刷”^②。也即是说这种避邪物虽然上面刻有较多文字，但是它并不是用于印刷。此外，它与用于印刷的雕版还有一个区别是，雕版上的文字是反着写的文字，而这种避邪印上的文字是正着写的文字。笔者认为，其实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就已经发明了印章，如秦始皇时期规定，皇帝所用的印叫玺^③。印章的工作原理与雕版印刷的工作原理相同，都是在物体（主要是石质或木质物体）上反刻文字，然后在所刻的文字上涂上墨，最后将它压在印刷物（如纸张）的表面，这样在印刷物的表面上就呈现出正写的文字。因此，印章有可能也为雕版印

① 张秀民. 中国活字印刷史[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194-197.

② 蒋元卿. 中国雕版印刷术发轫考[J]. 安大季刊，1936，1（2）：145-158.

③ 赵毅，赵轶峰. 中国古代史（下册）[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201.

刷术的发明者一定的启迪。清人李元复说雕铸板印之法“创之者初不必甚难，以自古有符玺，可师其意，正无待奇想巧思也”^①；近代学者张绍勋也认为“从石碑、印章、符印逐渐演变，经过无数人的钻研改进，我们的祖先终于发明了雕版印刷术”^②。但是，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印章对于雕版印刷的发明可能没有什么启迪作用，例如，魏隐儒认为“李元复说雕版始于六朝是可以师法古代符玺，并不甚难，这只是李氏主观臆测，并未提出证据”^③。由于雕版印刷术发明的年代久远，现在无法找到确切证据证明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受到过印章工作原理的启迪，因此，笔者只能说印章的发明有可能为雕版印刷的发明有所启迪。

我国雕版印刷技术发明的确切时间现在已经无法考证。我国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图书是唐朝咸通九年（868）印制的《金刚经》，它于清朝时期被发现于甘肃敦煌的藏经洞内，后来被偷运到境外。目前该书被收藏于英国伦敦博物院^④。从印刷技术上看，这本书“在技术上已经很进步，表示在此以前必然已经经过一个很长时期的演进，它比欧洲谷腾堡发明刻印以前的任何刻书，都要精致”^⑤。

虽然我国雕版印刷的发明时间至少要上溯到唐朝时期，但

① 魏隐儒. 中国古籍印刷史[M]. 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32.

② 张绍勋. 中国印刷史话[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13.

③ 魏隐儒. 中国古籍印刷史[M]. 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35.

④ 尚钺. 中国历史纲要[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219.

⑤ 卡特. 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M]. 吴泽炎，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55.

是，在唐朝时期雕版印刷并未得到广泛使用，“版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①始印《五经》，已（以）后，典籍皆为版本”^②。由于五代存在的时间短暂，因此，可以推知，版印书籍的大量出现应在宋代。

到了明清时期，雕版印刷技术已经发展到十分完善的地步。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套版印刷术得到广泛应用

“所谓套版印刷术，是利用不同颜色，区分不同的内容，让读者一目了然。其做法是用一块版分两次或多次印刷完成。比如正文用黑色敷印，眉批眉评、行间评注用红色敷印，在印刷时，必须使再次加印的版框严密吻合，因而在技术上要比单纯的一色印刷复杂得多。”^③我国的套版印刷术出现较早，已知现存最早的套色印刷品是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金银色火焰纹印花纱^④。但是，套版印刷在明代后期（17世纪）以后才得到了广泛使用。

（2）“短版”和“拱花”技术的发明

到了明代以后，套版印刷还得到了进一步的改进，即“短

① 即五代时人冯道，笔者注。

② 沈括. 梦溪笔谈[M]. 张富祥，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02：198.

③ 《广东印刷》编辑部. 明代凌濛初推动套版印刷不断创新[J]. 广东印刷，2020（4）：60.

④ 薛慧芳. 中国古代套色印刷考略[J]. 龙岩学院学报，2014（4）：125. 从此条史料可知，既然在早于汉灵帝时期的汉墓中就发现了现存最早的套色印刷品，那么前文中蒋元卿认为始自汉灵帝熹平四年的经典刻石是直接使中国图书走上雕版印刷的途径应该是错误的。

版”和“拱花”技术的发明。它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块小木版，然后逐色依次套印或叠印，最后形成一幅完整的彩色画图”。所谓拱花技术，“是用凸凹两版嵌合，使纸面拱起的办法，与现代钢印的效果很相似”^①。

（3）影刻技术的应用

明清时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影刻的书籍，被称为影刻本。所谓影刻本是以某本需要刻印的书作为底本，在原书上蒙上一张透明的纸，“把原书的版式、边栏界行、版口鱼尾以及行款字数、字体等原样描摹下来，然后再将描摹的书页反贴上版镌刻，这样雕印出来的书籍，就称之为影刻本”^②。影刻技术的发明与明清时期藏书家们佞宋、佞元有关系。所谓佞宋、佞元，即是说藏书们酷爱宋版、元版书籍。由于明清藏书家们佞宋、佞元，但是流传下来的宋版、元版书籍数量有限，因此，人们便发明了影刻技术，在尽量保证宋元版书籍原貌的前提下，印刷出更多的书籍。在复印技术发明之前，通过影刻的方式能够最大限度地复原宋、元版书籍的本来面目，将宋元善本化为许多复本，从而保存了古籍的本来面目，保证珍贵古籍不被佚失。

2. 传统活字印刷术的发展

我国传统活字印刷术是宋朝的毕昇发明的。毕昇发明的活

① 肖东发. 中国编辑出版史:上册[M]. 沈阳:辽海出版社,2002:346-348.

② 晓白. 影刻本与影写本有什么不同[J]. 中国工会财会,2016(12):57.

字是用胶泥做成。其方法是：

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腊（蜡）和纸灰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就火炆之，药稍镕（熔），则以一平板按其面，则字平如砥……常作二铁板，一板印刷，一板已自布字，此印者才毕，则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用讫，再火令药镕（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

从沈括的描述可知，当时人们使用的活字是用被烧硬的泥土做成的，而人们不使用木活字是因为当时无法克服木活字在印刷上的技术难度，也即木活字“木理有疏密，沾水则高下不平，兼与药相粘不可取”^①。进入明清以后，木活字开始得到较广泛使用，说明此时人们已经解决了木活字在印刷中存在的沾水之后就高低不平，同时又容易与铁板上垫铺的材料粘在一起取不下来这样的技术问题。明清时期木活字以清代武英殿聚珍板“最名于世”。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起，清廷以木活字大量印刷书籍，这些书籍被称为“武英殿聚珍板丛书”^②。

继泥活字、木活字之后，锡活字、铜活字、铅活字（指中国传统的铅活字印刷术，它有别于清末西方传入中国的铅活字技术）等金属活字印刷术也逐步得到发展：锡活字可能发明于

① 沈括. 梦溪笔谈[M]. 张富祥,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198.

② 净雨. 清代印刷史小记[J]. 武昌文华图书科季刊, 1931, 3(4): 470-471.

元代，大约在元朝初年，一位不知姓名的发明家认为锡的熔点低，适宜于用字模浇铸活字，于是就发明了锡活字。但是，这种锡活字印刷术并没有得到广泛运用^①。铜活字发明于明代。明朝时期，在苏州、无锡、南京一带，活字印书盛行，尤其以无锡华燧和安国的铜活字书最为出名^②。铅活字也是发明于明代，但是，史书中关于铅活字的记载很简略，在陆深的著作《金台纪闻》中有关于铅活字的记载。但是，中国传统的铅活字并没有得到大量使用^③。

此外，明清时期还发明了磁活字印刷术。但是，这种磁版印书也不多见^④。

总体来说，在西方新印刷技术传入中国之前，中国的活字印刷术使用得较少，在当时中国占主流的印刷还是雕版印刷，“活字本的数量仅及雕版书之百分之一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政府对活字印刷重视不够，活字印刷技术困难，活字制造一次性成本高，印刷数量小时活字印刷优势难以体现等，都是导致活字印刷长期未被广泛使用的原因。^⑤

3. 新印刷术的传入

早在明朝万历十八年（1590），在澳门的天主教耶稣会士

① 张绍勋. 中国印刷史话[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80.

② 魏隐儒. 中国古籍印刷史[M]. 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211-212.

③ 张绍勋. 中国印刷史话[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90.

④ 魏隐儒. 中国古籍印刷史[M]. 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88：242.

⑤ 张秀民. 中国活字印刷史[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194-197.

出版了拉丁文的《日本派赴罗马之使节》一书，这是在我国境内使用欧洲铅印活字印刷的第一部书，证明当时已经有铅字和印刷机进入澳门^①。由于澳门当时被葡萄牙所侵占，加之使用这种印刷技术的是外国人，因此，尽管西方活字印刷术很早在澳门使用，但它传入中国内地的时间却要晚得多。到了十九世纪，一些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周边的马六甲、檳榔屿一带采用西方铅印术、石印术来印刷中文书籍，后来又将这些技术传入我国的广州、澳门等地。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变成通商口岸，一些外国传教士开始进入上海传教，同时他们将西方的活字印刷术和石印技术也传入上海。1843年，麦都思在上海创立墨海书馆，并利用西式铅印术和石印术印刷书籍。1860年，美华书馆也迁到上海，并在活字印刷技术方面进行了很多革新。在这两家西方人创办的印书馆的影响下，一些中国人也纷纷设立出版社、报馆等并采用西式先进的印刷技术印刷出版物^②。我国境内第一个学会石印术的中国人是屈亚昂，他跟传教士马礼逊的次子马儒翰（即约翰·莫里森）学习石印术，常在澳门印刷一面经文、一面图画的宣传品。按马礼逊1807年来华，卒于1834年推测，屈亚昂学会石印技术的时间应在1832年左右。到了清朝末年，上海的富文阁、藻文书局、宏文书局等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印刷出版机构也开始采用五彩石印技术^③。近

① 范慕韩. 中国印刷近代史[M]. 北京：印刷工业出版社，1995：61.

② 韩琦. 晚清西方印刷术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以石印术的传入为例[M]. 韩琦. 中国和欧洲——印刷术与书籍史，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114-116.

③ 张秀民. 中国印刷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580.

代上海出现了近百家石印书局，它们出版了大量的石印书籍，远销全国各地^①。上海的墨海书局最早采用西方铅印技术印刷书籍，此后一些华人也开始仿效设立印书馆，并使用西方铅印技术^②。光绪二十三年（1897）以后，商务印书馆、成业、美生、谢文益、南洪泰等印书局相继成立，“铅印营业，于是渐盛”^③。

4. 清代出版业的发达

清代图书出版业发达，参与图书出版的实体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大部分：官府及宫廷、民间书坊、学校及书院、私人。进入清朝中后期以后，具有现代意义的出版企业开始在中国出现。由于这些具有现代意义的出版企业采用了先进的印刷技术和生产组织方式，它们所出版的书籍质量高、价格便宜，因此到了清朝中后期，它们成为出版业的主流。

（1）官府及宫廷出版

“清代的宫廷刻书是在明代宫廷刻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要由内务府领导，世称‘内府刻书’。因内府刻书以武英殿为刻书中心，所刻图书统称‘武英殿刻本’，简称‘殿本’。据统计，清代各朝刊刻的殿本书达七百余种。”^④清代武英殿所出版

① 邹振环. 土山湾印书馆与上海印刷出版文化的发展[M].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 出版博物馆. 出版文化的新世界: 香港与上海.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9.

② 铅印发轫小志[M]. 陈荣广. 老上海. 上海: 泰东图书局, 1924: 20.

③ 杨德惠. 铅印业[J]. 商业月报, 1940, 20(1): 3.

④ 翁连溪. 清宫武英殿刻书[J]. 中国典籍与文化, 2000(4): 54.

的书籍中,《四库全书》是其著名的出版品。

清代内府刻书的机构除武英殿修书处以外,还包括中央六部、监、院以及苏州、杭州二诗局^①等。清代内府印刷书籍采用了雕版印刷、铜活字、木活字、石印、铅印等多种印刷技术,出版了包括满、汉、蒙、藏、维文等多种民族文字的图书^②。

自宋代以来,历朝各级地方政府及有关单位都热衷于刻书。在清代,除内府刻书外,各省、府、州县政府及各有关单位都刻有不少图书,尤其是在长江中下游、黄淮流域、岭南闽北、四川两浙等地区,官府所刻的书更多。清代地方官府所刻印的书籍包括地方志、经史子集等四部之书等。到了清朝后期,各省均先后设置了官书局,这是专门的出版机构,是清代所特有的历史现象^③。官书局所出版书籍范围更加广泛,除本国书籍外,“各国书籍,凡有益于国计民生与交涉事件者,皆译成中文,广为流布”^④。

(2) 民间书坊刻书

书坊刻书是书籍生产的基本力量。在各种出版实体中,书坊的分布最广,影响最大^⑤。所谓书坊是指“中国封建社会中晚期(唐代—清代)为满足市场需要而进行生产兼营销售印本书

① 此处“杭州诗局”或为“扬州诗局”,笔者联系李欢先生求证未成,还请各位读者指正。

② 李欢. 清代宫廷刻书的沿革与概况[C]//武斌. 多维视野下的清官史研究——第十届清官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现代出版社,2013:520.

③ 李致忠. 历代刻书考述[M]. 成都:巴蜀书社,1990:327.

④ 合. 清季之官书局[J]. 教育时报,1943(15):28.

⑤ 刘国钧. 中国古代书籍史话[M]. 北京:中华书局,1962:106.

的私营单位”^①。书坊不同于个体经营，它与其他手工业作坊一样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到了清代，有的书坊的经营开始了向资本经营集团化发展的趋势。有的书坊最终发展为规模十分庞大的、具有出版社性质的经营实体。例如，洞庭山席氏所经营的书坊扫叶山房到清末时已在苏州、上海彩衣街、沪北等多地设有刻书处^②。除此之外，吕留良的天盖楼刻局、张作南的退补斋书局等书坊也都最终发展成为具有出版社性质的经营实体^③。由于印刷业的发展，清代书坊十分普遍，全国各地都有书坊分布^④。

(3) 书院刻书

书院是最早产生于唐代的一种中国士人的文化教育组织，它是在书籍大量流通于社会之后，读书人以书为中心进行藏书、校书、写书、刻书、读书、教书等活动，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和传播的必然结果^⑤。书院刻书在我国古代出版史上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类型而存在的。书院刻书的目的是为教学服务。因此，书院所刻印的书籍主要是配合课程教学的教材、参考读物以及配合教学管理的书院文献等。

在清代，书院也是重要的图书出版机构。清代书院刻书较其他朝代书院刻书多。当时，从事刻书的著名书院有二三十家。

① 戚福康. 中国古代书坊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8.

② 涵秋. 扫叶山房[J]. 文艺杂志. 1914(11): 90.

③ 顾志兴. 浙江藏书史[M]. 杭州: 杭州出版社, 2006: 572-573.

④ 魏隐儒. 中国古籍印刷史[M]. 北京: 印刷工业出版社, 1988: 168.

⑤ 邓洪波. 中国书院史(增订版)[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 2.

有的书院刻书数量庞大。例如，学海堂共刻书 3334 卷。广雅书院所附设的广雅书局共刻书 5746 卷。南菁书院所附设的刻书局仅所刻的《皇清经解续编》就多达 1430 卷^①。据不完全统计，四川尊经书院共刻书 1912 卷，575 册^②。

(4) 私人刻书

中国的藏书家、官僚、地主、富商等历来有刻印书籍的传统。在这些热衷于刻书的人群中，很多人士都是藏书家。学者萧东发认为，“中国出版史上颇有影响的私人刻书家，几乎都是著名藏书家”^③。

在清代，由于藏书家所刻印书籍质量好、刻印书籍数量庞大，因此，藏书家刻书在清代出版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清代藏书家热衷于刻书是当时特定社会形势下的一种历史现象，它与考据学（亦称朴学、汉学）兴盛、书市图书质量差、藏书家希望刻印书籍泽被后世等因素相关。清朝时期，考据学成为中国学术的主流。考据学家们从事音韵、训诂、辑佚书、辨伪书等研究工作都需要大量高质量的书籍作为研究对象。没有大量高质量的书籍，考据学家们无论有多大的能力也不可能做出什么研究成果。虽然这些学者型藏书家从事学术研究所需书籍有一部分可以通过书市购买，但是，研究所需的许多珍本、

① 曹之. 书院刻书漫话[J]. 四川图书馆学报, 1985(2): 71.

② 黄海明. 概述四川尊经书院的刻书[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2(4): 103.

③ 萧东发. 私人藏书家的刻书活动及其贡献[M]. 黄建国, 高跃新. 中国古代藏书楼研究.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58.

孤本、抄本只能从其他藏书家处获取。他们为了能够从其他藏书家处获得自己所需书籍，便将自己所藏的珍贵图书刻印出版，并用它们向其他藏书家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图书。学者顾志兴也认为，清代藏书家“刻书为增加自己藏书，亦可作交换用，己有所赠，人必有馈”^①。当时书市提供的图书质量差，无法满足考据学家们的研究需求也是他们热衷于刻书的一大原因。清代书市中的图书多为书坊所印制。书坊印书以盈利为目的，有的书坊为获取利益，不惜偷工减料，牺牲图书质量。清代藏书家卢文弨就曾抱怨书市中图书“真伪不分，雅俗不辨，或删削而非完善，或脱误而鲜校讎”。例如，一部《风俗通》本来有10卷，而有的书坊所印制的《风俗通》却仅有4卷^②。藏书家叶德辉说，书坊为获暴利常用明版书冒充宋版书，它们“或抽去重刊书序，或改补校刊姓名，或伪造收藏家图记，钤满卷中，或移缀真本跋尾题签，掩其贗迹”^③。即使是官印书籍，其质量有时也不尽如人意。例如，叶德辉认为清朝宫廷出版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编辑潦草^④。由于书市中图书质量差，藏书家们有时为了获得理想书籍，只能自己印制。

在清代，许多人将刻印书籍看成泽被后世的善举：张之洞

① 顾志兴. 浙江藏书史[M]. 杭州：杭州出版社，2006：571.

② 卢文弨. 鲍氏知不足斋丛书序[M]//卢文弨. 抱经堂文集：第一册.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69.

③ 叶德辉. 坊估宋元刻之作伪[M]//叶德辉. 书林清话（附书林余话）. 北京：中华书局，1959：264.

④ 叶德辉. 武英殿聚珍板之遗漏[M]//叶德辉. 书林清话（附书林余话）. 北京：中华书局，1959：241.

认为“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①；张海鹏主张“藏书不如读书，读书不如刻书。读书只以为己，刻书可以泽人，上以寿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后来之沾溉”^②；叶德辉认为刻书是“积书与积阴德皆兼之，而又与积金无异”^③之事。在刻印书籍泽被后世思想的影响下，清代许多人士都热衷于刻书。

清代私人刻书不以营利为目的，他们十分注重书籍的印刷质量，所刻印书籍质量较高，“疏误少而精本多”^④。此外，清代私人刻书数量也十分庞大：在清代，仅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参与刻书的藏书家就有 367 人^⑤。许多藏书家终身从事刻书事业，所刻书籍众多。例如，张海鹏所刻的书有：《学津讨原》丛书收书 170 种，共 1410 卷；《墨海金壶》收书 115 种，共 700 余卷；《借月山房汇钞》收书 135 种；《太平御览》1000 卷^⑥，其刻书总量高达数千卷；张金吾所刻书包括：《续资治通鉴长编》500 卷、《金文最》120 卷、《诒经堂续经解》1436 卷等^⑦；藏书家毛晋前后招进刻工数百人，刻书有 604 种之多，家中的

① 张之洞. 劝刻书说[M]//张之洞. 书目答问二子部.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78.

② 黄廷鉴. 朝议大夫张君行状[M]//黄廷鉴. 第六弦溪文钞. 北京：中华书局，1985：84.

③ 叶德辉. 总论刻书之益[M]//叶德辉. 书林清话（附书林余话）. 北京：中华书局，1959：2.

④ 曹培根. 苏州传统藏书文化研究[M]. 扬州：广陵书社，2017：60.

⑤ 王桂平. 清代江南藏书家刻书研究[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2.

⑥ 萧东发. 私人藏书家的刻书活动及其贡献[M]. 黄建国，高跃新. 中国古代藏书楼研究. 北京：中华书局，1999：70.

⑦ 曹培根. 苏州传统藏书文化研究[M]. 扬州：广陵书社 2017：60-61.

书板逾十万块^①。清代私人刻书不仅数量大而且质量高，私家刻书不仅为后世遗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图书，也成为私家藏书家藏书的重要来源，从而促进了清代藏书事业的发展。

5. 书市繁荣

印刷术的发展，使得书籍印刷变得越来越简便，书籍的价格也越来越便宜。例如，使用雕版印刷的一本大字本《康熙字典》售价为15元，而一本石印的《康熙字典》其售价仅为1元6角到3元之间^②。加之官府、书坊、书院以及私人都积极从事书籍的出版工作，这带来了繁荣的图书市场。到了清代中晚期，近代出版机构大量涌现更进一步刺激了图书市场，例如，在光绪前后，上海新开设之书店如雨后春笋，均采用西法印书，上海乃代替北京，成为全国最大的出版中心^③。在清代“各刻书要地有堂号可考的，如北京112家，苏州53家，广州23家，佛山12家”^④，这些刻书铺在刻印图书的同时，许多也从事图书销售活动。清代书市还有一个特点是许多书铺往往集中于街市某一地区，形成图书销售街区。例如，清代时，北京地区最有名的书市集中于三个地方，当时人们习惯称之为“一厂二寺”。其中“一厂”即是琉璃厂，“二寺”即为慈仁寺（今名报国寺）、隆福寺。慈仁寺在宣武门外，在清朝初年时这里的书市就已经

① 肖东发. 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243-244.

② 宋原放. 中国出版史料：近代部分第3卷[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406.

③ 张秀民. 中国印刷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589.

④ 李瑞良. 中国古代图书流通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56.

颇为兴旺，顺治、康熙年间的文人笔记中时常提及它。隆福寺书市，最初由一些书摊发展而来^①。在“一厂二寺”中，规模最大，名气最盛的当数琉璃厂书市。琉璃厂是北京的一条文化街，“为北平书肆菁华所聚”^②，“街长里许，百货毕集，玩器书肆尤多”^③，据统计，当时琉璃厂内仅书铺就有三十多家^④。由于图书市场的发达，在清代图书流通渠道类型已经十分复杂，除固定销售渠道外，也存在大量的流动性销售渠道。固定图书销售渠道包括固定店铺、书摊、考市售书等；流动图书销售渠道包括书船、流动售书点、邮局寄送等^⑤。此外，在清代还出现了许多兼卖图书的店铺，例如，苏州华英药房、宁波华美药房、玉华英药房、汉口中西药房、福州寿人氏药房、况壶天西药房、山东济南府陆军医院等也在兼营销售商务印书馆的图书^⑥。非书店的店铺兼营图书证明当时书市之繁荣。

书市的高度发达使得藏书家们获得书籍变得越来越容易。曹溶认为，由于印刷术发达促进了书市繁荣，“挟资入贾肆，可立致数万卷”^⑦；张金吾也认为，“至于今，犖数千金至市可立致万卷”^⑧；朱彝尊说清代时江浙一带书市发达，“操一囊金，

① 商鸿逵. 北平旧书肆[J]. 人间世, 1935(29): 30.

② 惜华. 旧京书肆之调查[J]. 北京画报, 1931, 4(176): 2.

③ 汪启淑. 琉璃厂[M]. 汪启淑. 水曹清暇录,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98: 77.

④ 史树青. 琉璃厂杂记序[M]. 周肇祥. 琉璃厂杂记, 北京: 燕山出版社, 1995: 序1.

⑤ 孙文杰. 中国图书发行史[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5: 311.

⑥ 孙文杰. 清代图书市场研究[D]. 武汉: 武汉大学, 2010: 27.

⑦ 曹溶. 流通古书约[M]. 上海: 古典文学出版社, 1957: 35.

⑧ 张金吾. 爱日精庐藏书志序·爱日精庐文稿[M]//《清代诗文集汇编》编

入江浙之市，万卷可立致”^①。由于书市发达，藏书家购书变得十分容易，导致清代藏书事业较之前时代更为发达。

总之，清代考据学发达、印刷技术提高、书市繁荣，以及清代进入中国封建学术文化的总结时期等因素，是清代藏书事业发达的主要原因，并使得清代藏书事业达到中国封建社会藏书事业之顶峰。这也是作者以清代藏书文化作为研究对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纂委员会. 清代诗文集汇编: 第 554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193.

① 朱彝尊. 池北书库记[M]//朱彝尊. 曝书亭全集. 吉林: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9: 650.

第二章

清代藏书文化的特点

在清代，我国藏书文化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此时，我国藏书的主体大约可分为以下几大部分：官府和皇室藏书、私人藏书、学校和书院藏书、寺院藏书等。到了晚清时期，图书馆开始在中国普及，图书馆藏书逐渐成为一大重要的藏书主体。相较于其他时期藏书文化而言，清代藏书文化具有如下特点。

一、藏书规模大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随着印刷出版业的发展，清代时期藏书规模较之前时代空前扩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藏书楼多

清代藏书楼分为私家藏书楼和公家藏书楼两大类。据统计，“清代的私家藏书楼有五百多个”^①。

在公立藏书楼方面，在中央，有皇家藏书楼和中央各机关藏书楼，在地方各省也设置有藏书楼。在皇家藏书方面：乾隆年间，四库全书编纂完成后，一共抄录了七套，分别储藏于大内（北京故宫）文渊阁、盛京（沈阳）文溯阁、御园（北京圆明园）文源阁、热河（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江苏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镇江金山寺的文淙阁、浙江杭州圣因寺的文澜阁。

^① 谭卓垣，伦明，等. 清代藏书楼发展史续补藏书纪事诗传[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37.

其中，文津阁除了藏有《四库全书》外，还藏有《古今图书集成》^①。清高宗时期，清廷将所收集的宋、元、明三代之旧版书籍度藏于昭仁殿中，并题曰“天禄琳琅”。乾隆四十一年（1776）以后，清廷将所得之书存放于御花园之养性斋中^②。清代的皇帝们大都喜欢读书，为了能够随时随地取书阅读，他们喜欢将各种书籍度藏于他们时常光顾之处，例如紫禁城内廷、行宫、苑囿、寺庙等处，在清宫内廷除前文提到的文渊阁、昭仁殿等处外，摘藻堂、乾清宫、懋勤殿、上书房、古董房、御书房等处都收藏有大量的书籍。清朝皇室收藏书籍最丰富的时期是乾隆时期，当时宫廷收藏的图书总数达十万部之多^③。

在各中央机关也有不少藏书楼，例如内阁大库，它隶属于内阁，是内阁存贮档案册籍的处所^④。内阁大库有2个，两库的建筑形制完全相同，其所藏书籍资料分别归属于内阁典籍厅和内阁满本房（后来又称为满本堂）2处。据王正功《中书典故汇记》记载，典籍厅有库房10间，存放有红本书、典籍、关防等；满本房也有库房10间，其中5间存放实录、史书、录疏、起居注以及前代帝王、功臣画像等。另外5间存放有书籍、三节表文、表匣以及外藩表文等^⑤。

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承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文津阁 [M].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9-12.

② 箴论. 昭仁殿所藏书[J]. 国际公报，1927，5（5-6合刊）：32.

③ 杨玉良. 武英殿修书处及内府修书各馆[Z]. 杨新. 故宫博物院七十年论文选，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182.

④ 费愉庆. 中国古代官府藏书机构考[J]. 当代图书馆，2004（3）：77.

⑤ 徐中舒. 再述内阁大库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J]. 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

各官方修史机构也藏书丰富。我国历代王朝都十分注重修史工作。在清代，常设的修史专门机构有国史馆、方略馆、起居注馆、玉牒馆、武英殿修书处^①、实录馆^②等。由于编修史书需要大量书籍、档案等资料作为参考文献，因此各官方修史机构都藏有大量的图书典籍。例如国史馆为清代修史机构，它隶属于翰林院^③。国史馆内存有大量书籍、档案。为了便于存放国史馆内的大量书籍、资料，国史馆设有书库^④。为管理国史馆内图书、资料，国史馆设有专职的收掌官、供事等官员负责图书管理，并规定“书库收藏朱批谕旨、红本、记注以及各处档案书籍和随时纂出之实录正副本，由‘收掌官一员，率供事二员专司档簿，注明某书于某日由某处收到，计若干本。馆中有人领看，亦即收取领条，逐日记明，每届十日提调官查点一次，倘有遗失破损，惟该收掌等是问’”^⑤。方略馆也是官方修史机构，它负责编修方略类史书。所谓方略是指清代的战争专史^⑥。方略馆为清代时期所特有的一种修史机构，它最初设置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至乾隆时期成为

言研究所集刊，1933，3（4）：538.

- ① 多彩姚继荣. 清代方略馆与官修方略[J]. 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2): 75.
- ② 费愉庆. 中国古代官府藏书机构考[J]. 当代图书馆, 2004(3): 77.
- ③ 王树卿, 李鹏年. 清宫史事[M].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1986: 310.
- ④ 王树卿, 李鹏年. 清宫史事[M].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1986: 311.
- ⑤ 王记录. 清代史馆的运作及其特征探析[M]. 杨共乐.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5年卷),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109.
- ⑥ 姚继荣. 清代方略馆与官修方略[J]. 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2(2): 75.

常设机构^①。方略馆设置有收掌官 4 人（满、汉各 2 人），负责“章奏文移、治理吏役”。为了保存档案、收藏书籍，在方略馆还设有大库。方略馆大库除主要收藏有档案、书籍外，还收藏有大量的舆图和各种物件。方略馆大库所收藏的书籍主要有两类：一是方略馆所编纂的钦定方略、纪略等书籍；二是钦定方略、纪略以外的其他书籍，这些书籍以清代官修的各种书籍为主^②；实录馆是负责编纂《实录》《圣训》等史书的修史机构。为编纂需要，清代实录馆也设置有书库，保存了大量书籍、档案等资料。实录馆保存的书籍、档案等资料大致可分为四大类，即官文书、文书汇抄档册、档案史料汇编、史籍和撰著。实录馆所保存的书籍、档案主要是从京内外各衙门调取而来^③。

清末新政后，清政府成立了学部。1908 年学部藏书楼建成，该藏书楼为两层建筑，上层藏中文图书，下层藏外文图书^④。

总体而言，清朝中央层面共有大大小小的藏书处数百处。它们分布于各宫廷、皇家苑囿、各地行宫^⑤，以及各修史机构等处。

各地方政府也建有藏书楼。例如：浙江省学台于 1902 年创办了浙江藏书楼，它是在原有的东城讲舍藏书楼基础上改

① 李金飞. 清代方略馆及其编纂活动述略[J]. 历史档案, 2020(3): 75.

② 任继愈. 中国藏书楼(二)[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0: 1208-1213.

③ 任继愈. 中国藏书楼(二)[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0: 1215-1218.

④ 学部藏书楼告成[J]. 时事报图画杂俎, 1908(56): 6.

⑤ 肖东发. 中国官府藏书[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9: 151.

建而成，由浙江省学台拨白银一万两购买房舍，并重新添买一些书籍之后形成^①；福州府太守程听彝创办了鳌峰藏书楼，储藏中外新旧书籍。鳌峰藏书楼的书籍来源有两部分，一部分来自原来的鳌峰书院旧藏书籍，另一部分书籍购自上海，而购书所需经费白银 2000 两由福州府所筹措^②。1907 年江北淮安藏书楼落成，并由提督荫午帅委派阮广文全权负责管理淮安藏书楼事务^③。1902 年，学台张燮钧筹措白银一万两改建了杭州藏书楼后，又下令各府一体仿行，筹措经费创办藏书楼^④。相对于中央层面的藏书楼而言，各地方兴建藏书楼相对较少，规模也相对较小。

此外，各地方上还有大量以学校（或书院）附设的藏书楼，它们也属于公立藏书楼。“藏书和讲学、祭祀一起，历来被称为书院的三大事业”，为了教学需要，许多书院和学校都藏有丰富的图书。在清代全国各地有确切藏书数目可考的书院就多达百余所，其数量比唐、宋、元、明四个朝代数量之总和还多^⑤。书院藏书主要是为教学服务，其所藏书籍以教材、教学辅导书籍和参考书籍为主，因此，学校（或书院）藏书各类较官府和皇家藏书要单调，其影响力也远不如官府或皇家藏书。

① 浙江藏书楼新章[J]. 杭州白话报, 1902, 2(32): 3.

② 福州藏书楼纪要[J], 选报, 1902(25): 24.

③ 委员管理藏书楼事[J]. 北洋官报, 1907(1501): 12.

④ 杭州藏书楼记事[J]. 杭州白话报, 1902, 2(29): 1-2.

⑤ 刘青. 明清书院刻书与藏书的发展及其影响[J]. 图书馆学刊, 2004(5): 8.

2. 私人藏书楼的藏书量大

在唐代之前，由于图书制作主要是靠人工抄书，图书制作成本高，导致绝大多数普通人家无力大量购藏书籍，因此，此时期的图书多是藏于官府兴办的藏书楼，但是“自雕本盛行而书籍易得，民间镂版，未贡天府者且十之九，由是官书反不若民间之多”^①。到了清朝，随着印刷技术的进一步提高和图书市场的繁荣，藏书家获取图书较之前时代更加容易，因此，各私人藏书家和他的藏书楼通常都藏有大量书籍。例如：杨氏海源阁藏书十几万卷；济南藏书家周永年藏书十万卷，高平藏书家张承纶藏书二十余万卷^②；杭世骏“所藏书，拥榻积几，不下十万卷”^③；瞿镛所积书十余万卷^④；扬州小玲珑山馆藁书楼内藏书十余万卷^⑤；陆心源的皕宋楼藏书连同他其他藏书处的藏书总数超过二十万卷^⑥；“朱少卿豫堂日使子弟物色之，积数十年，蓄数十万卷”^⑦；藏书家杨守敬一生收藏古书数十万卷^⑧；郁松

① 朱彝尊. 池北书库记[M]//朱彝尊. 曝书亭全集. 吉林：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650.

② 周少川. 藏书与文化：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研究[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93.

③ 丁申. 道古堂[M]//丁申. 武林藏书录.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64.

④ 庞鸿文. 藏书家[M]//庞鸿文. 重修常昭合志稿五十卷. 活字本. 上海：时中书局活版部代印，1904（清光绪甲辰年）.

⑤ 全祖望. 藁书楼记[M]//全祖望. 鮑琦亭集外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065.

⑥ 出版说明[M]. 郑元庆，等. 吴兴藏书录皕宋楼藏书源流考，上海：古籍文学出版社，1957：说明2.

⑦ 李文藻. 琉璃厂书肆记[M]. 李文藻. 南涧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19.

⑧ 杨守敬. 邻苏老人年谱[M]. 谢承仁，主编. 杨守敬集：第1册. 武汉：

年“好读书，购藏数十万卷”^①；刘承干自述，他在十多年时间里积书多达五十万册^②。袁同礼认为，清代藏书家钱谦益“既得刘子咸、钱功父、杨五川、赵汝师四家书，更不惜重资，购古书百万卷，所藏冠于东南，几埒内府”。为了储藏这些书籍，他在中年时期构筑了拂水山房，到晚年时又构筑了绛云楼，专门用于庋藏书籍^③。至于藏书在十万卷以下的藏书家就更多了。

3. 藏书家人数众多

据统计，清代有文献记录的藏书家多达 2082 人，超过了之前历代藏书家人数的总和。其中，藏书量在万卷以上的就有 543 人^④。清代藏书家数量众多与清代印刷业发达，图书价格相对便宜有关，使得有更多的人有能力从事藏书事业。清代考据学发达，考据学家人数众多，他们为工作需要大量收藏图书，这也是清代藏书家人数多的一大原因。此外，清朝时中国封建文化进入了总结时期，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大力从事大型类书和丛书的编纂工作，这客观上刺激了藏书事业的发展。

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26。

- ① 洪有丰. 清代藏书家考(续)[J]. 图书馆学季刊, 1926, 1(2): 314.
 ② 刘承干. 熹业老人八十自叙[M]//缪荃孙, 吴昌绶, 董康. 熹业堂藏书志.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7: 1410.
 ③ 袁同礼. 清代私家藏书概略[J]. 图书馆学季刊, 1926, 1(1): 33.
 ④ 范凤书. 中国私家藏书史[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3: 266-322.